

B. C. 斯焦宾与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出场

B. C. Стёпин and the Appearance of Post-Non-Class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耿海天 /GENG Haitian

(河北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张家口, 075000)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th University, Zhangjiakou, Hebei, 075000)

摘要: 维·谢·斯焦宾院士是享誉世界的苏联和俄罗斯著名科学哲学家, 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斯焦宾院士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 针对从“经典科学”到“非经典科学”再到“后非经典科学”科学革命的事实, 提出了从“经典理性”到“非经典理性”再到“后非经典理性”的哲学-方法论转向, 进而实现了从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经典(或非经典)科学哲学”向以社会-文化主义为代表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转变。后非经典科学哲学是对当下由技术型文明产生的人类全球性危机的回应, 是从修订以往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 将关于自然界、社会、文化和人类的科学观点融合起来, 动态地、发展地思考自然科学、哲学人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大综合、大转向。苏联解体后, 斯焦宾院士在以往研究科学结构的基础上, 独创性地发展了后非经典科学哲学, 为人类走出技术型文明的困境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B. C. 斯焦宾 经典理性 非经典理性 后非经典理性 后非经典科学哲学

Abstract: Academician B. C. Стёпин is a world-renowned philosopher of sc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and winner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is scientific research, based on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from “classical science” to “non-classical science” and then to “post-non-classical science”, he proposed the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turn from “classical rationality” to “non-classical rationality” and then to “post-non-classical rationality”, thus realizing furthe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lassical (or non-class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presented by logical empiricism to “post-non-class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represented by social-culturalism. The post-non-class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s a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global crisis of mankind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grating the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on nature, society, culture and humanity, it is also a dynamic and developmental reflection on the great turn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ising previou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cademician B. C. Стёпин creatively developed the post-non-class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on the basis of his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proposed new solutions for humanity to get out of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B. C. Стёпин; Classical rationality; Non-classical rationality; Post-non-classical rationality; Post-non-class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3.08.0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俄罗斯)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研究”(项目编号: 21&ZD062)。

收稿日期: 2022年11月30日

作者简介: 耿海天(1976-)男, 河北张家口人, 河北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苏联(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Email: 422176149@qq.com

俄罗斯科学院维亚切斯拉夫·谢苗诺维奇·斯焦宾(В. С. Стёпин, 1934–2018)院士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哲学家、方法论专家和科学活动组织者,他在科学认识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文化哲学等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斯焦宾较早总结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科学革命以及相对应的科学发展阶段:第一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7世纪,牛顿力学的成熟标志着经典科学(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的形成;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经典科学及其理论思维方式得以进一步发展、成熟;第三次科学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主要是以相对论和量子论为代表的非经典科学(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的形成;第四次科学革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以非稳态宇宙论和协同学为代表的后非经典科学(пост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应运而生,将自组织理论、进化论与系统方法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全球(普遍)进化论的基础上构建一般的科学世界图景。20世纪80年代末,斯焦宾又提出划分三种类型科学理性的观点,即与经典科学两个阶段相对应的经典理性(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与非经典科学相对应的非经典理性(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与后非经典科学相对应的后非经典理性(пост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1]作为科学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科学理性,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重叠”,即每一种新型科学理性的出现并没有抛弃前一种类型理性,而只是限制其应用范围,确定其仅适用于某些特殊的问题和任务。每一时期的科学理性都以旨在不断增长客观知识的科学活动的特殊状态为特征。如果我们将这些科学活动表示为主体、手段(操作)和客体三者的关系(在对主体的理解中包括活动的价值目标结构、方法和手段应用的知识 and 技能),那么,就可以把上述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看成是科学理性历史进化的不同类型,因为科学理性就是对科学活动不同深度上的反思。([2], pp.632–633)斯焦宾后非经典科学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的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位一体”(триада)

的新科学认识论,即“主体-方法和仪器-客体”^[3]相融合的大系统。在这样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综合体(比如生物圈)中,不仅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不可消除,而且人的利益即客体本身的人的尺度也不可消除。因此,后非经典科学就具有了人学转向的综合价值。

一、从“经典科学”到“后非经典科学”的全球科学革命

纵观科学发展史,可以区分出科学基础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发生了变化的时期,斯焦宾称之为“全球科学革命”(глобальная науч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发生在17世纪的全球科学革命标志着经典科学的形成。经典科学的形成与一个特殊的研究理想和规范体系密不可分,这些理想和规范代表了经典科学的进路并将其模式化。自17世纪以来,所有经典科学都遵循这样一种规范:只有把与主体及其认识活动程序有关的一切都排除在描述和解释之外时,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才得以保证。经典科学研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绝对真实的世界图景,也就是寻找明显的、可视的、“源于经验”的本体论基础(在这一时期机械论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解释和预测经验事实的理论。作为该体系的认识论部分,还出现了关于认知的概念,即通过观察和实验认识自然对象,这些对象向认知的大脑展现其存在的奥秘。此外,理性在认识论中被赋予了主导地位。“在理想情况下,理性被解释为与事物保持距离,就像从外部观察和研究它们一样,除了所研究对象的属性和特征之外,不受任何先决条件的决定。”([2], pp.620–621)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是在科学知识急剧增加的背景下形成的,科学知识转变为特殊产品并具有商业价值,能够在其生产和消费中带来收益。“在这方面,工程-技术科学作为基础知识和生产之间的中介正在形成一个应用系统。科学活动的各个领域正在走向专业化,相应的科学群体正在形成。”([2], p.626)

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球科学革命的结果是经

典科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第三次全球科学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新的非经典科学,它历经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个知识领域发生了连锁反应的革命性变化,主要有物理学(发现原子可分、相对论和量子论)、宇宙学(非稳态宇宙的概念)、化学(量子化学)、生物学(遗传学)等。与此同时,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正在兴起,它们在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 pp.622-623)斯焦宾认为,从经典科学到非经典科学的转变是由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欧洲文化中精神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经典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危机带来的,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对理性产生了新的理解。此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依赖于决定知识的态度、目标和价值取向的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里,非经典科学又发生着突飞猛进的变化,发生了第四次全球科学革命,诞生了新的后非经典科学。([2], p.626)在后非经典科学群中,生物学、天文学和地学是第一批需要考虑历史发展系统特殊性的基础科学,它们形成了新的现实的世界图景,包括历史主义思想和独特发展的客体(例如生物圈,超星系,以及作为地质、生物和人工过程相互作用的系统的地球)的概念。近些年来,物理学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物理客体历史演变的概念逐渐进入物理学现实的图景中:“一方面,是通过现代宇宙学的发展(宇宙大爆炸思想和在超星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物体的形成);另一方面是通过非平衡过程热力学(I.普利高津)和协同学思想的研究。”([2], p.629)

后非经典科学是基于17世纪的经典科学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非经典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后非经典科学重视系统性的跨学科研究,出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趋势,将人的价值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俄罗斯学者认为后非经典科学的特点是:“(1)在普遍(全球或全人类)进化论的基础上,从各个科学分支的不同世界图景中构建共同的科学世界图景;(2)将科学置于哲学人学和社会-文化价值论的语境中,即把科学与道德、真理

与善结合起来;(3)建立基于协同学的紧密学科联盟,建立人性化和自我发展的系统,即把人道主义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4]在这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中,以往经典科学的研究范式变得日益狭小、孤立和碎片化,而现代科学的特殊性在于由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参与其中和综合研究来实现的。这类研究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优先领域的确定、资金筹措、人员培训等。在优先研究方向的确立中,经济和社会政治目标以及教育本身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对复杂的历史发展系统的研究中,后非经典科学从根本上重建了科学活动的理想和规范。研究复杂对象的历史性及其行为的可变性,意味着需要广泛使用描述和预测其状态的一些特殊方法,也就是在“分叉点”上构建系统发展可能路径的各种实施方案。历史重构的理想开始越来越多地引入后非经典科学,斯焦宾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理论知识,在此之前主要应用于人文科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包括人本身在内的自然综合体占有特殊的地位。这种“人维度”综合体的例子有很多,例如生物-医学的综合体、包括整个生物圈的全球生态学综合体、生物技术(首先是生物工程)综合体、包括复杂的信息和人工智能综合体的人-机系统等。在研究“人维度”的综合体时,探求真理和确定该对象的研究战略与未来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而后者又直接受到人文社会价值的影响,这种类型的系统不能自由地进行实验研究。“在研究和实践中,需要禁止某些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战略危机意识开始发挥着特殊的作用。”([2], p.631)在后非经典科学中,以往中立价值观的研究理想正在发生转变,当客观真实的解释和描述被应用于“人维度”的对象时,也就允许把价值论因素也包含在解释原则中去。

因此,有必要阐明基本的科学内部价值(寻求真理、增长知识)与一般社会性质的科学外部价值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在涉及“人维度”对象的研究活动自身的进程时,研究人员必须

要解决一些伦理问题,这些问题规定了可能干预对象的伦理底线。“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寻求真理和新知识增长的科学内在伦理,不断地与一般人文主义原则和价值相互作用。所有这些新的方法论和对研究对象态度的发展变化导致了科学的哲学基础实现了显著的现代化。([2], pp.631-632)总之,科学认识开始在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后果的语境下被视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部分,在科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由特定历史时代的一般文化状况、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态度共同决定的。对全球科学革命历史性变化的理解不仅涉及到本体论预设,还包括科学认识的理想和规范的变化。在后非经典科学的哲学基础中,诸如“理论”“方法”“事实”“证明”“解释”等范畴的内容相应地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知识获取和存储革命,如果不考虑人在所研究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就不可能解决一系列新的科学问题。斯焦宾指出,现实世界不仅是一个自我发展的整体,而且是一个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混乱和无序的整体,协同学思想和方法是关于任何性质的系统的自组织和自我发展理论,后非经典科学的出现是越来越多地应用协同学思想的结果。后非经典科学把时间维度引入所有的科学,科学中关于人的价值的新思想越来越普遍。“在存在和发展之间架设桥梁”与“促进科学与人文的新融合”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维度”,但时间(发展)在后非经典科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经典科学的对象是简单的系统(小系统),非经典科学的对象是比较复杂的系统(大系统),那么后非经典科学的对象就是更加复杂的系统(自我发展的系统)。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人的作用的加强,在后非经典科学中哲学的所有功能(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价值论等)都会比前几个阶段更加积极,这是因为“技术型文明现在正在进入一个特殊类型的发展阶段,人文主义方针成为制定科学探索战略时的出发点。”([2], p.636)

二、从“经典理性”到“后非经典理性”的哲学方法论转向

1989年,斯焦宾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如何区别经典理性、非经典理性和后非经典理性的观点:“经典的理性类型只关注客体,而将所有与活动的主体和手段有关的东西都排除在外。非经典理性的特点是客体对于活动的手段和操作的相对性思想;这些手段和操作的运用是获得关于客体真理性知识的前提条件。最后,后非经典理性不仅要考虑关于客体的知识与研究手段的相关性,而且要考虑活动的价值目标结构。”([5], p.18)此后二十多年过去了,“后非经典”(Постнеклассика)的概念逐渐在俄罗斯科学哲学话语体系中生根发芽,今天被运用于描述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认识活动。斯焦宾认为,科学有三个基本的哲学方法论标准,这些标准一方面符合人类活动的规则,另一方面符合在这种规则下确定的科学基础的结构。从人类活动的角度来看,科学认识可以通过所掌握的活动主体、客体及其所使用的手段和操作之间的关系来表达。人类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主体-手段和操作-客体)构成了一个整体,其中每个组成部分的剧烈变化都意味着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主体、客体和手段的联系表现为科学基础的三个主要部分(子系统)之间的相关性和一致性:(1)科学的世界图景;(2)科学的理想和规范;(3)科学的哲学和世界观基础。因此,与之相对应区别科学理性类型也有三个标准:(1)被研究客体的系统组织的特点和世界图景类型;(2)表现为科学理想和规范的活动手段和操作的特点;(3)表现在科学哲学和世界观基础中的活动主体的价值目标取向及其反思的特点。([6], pp.249-250)具体而言,区分经典理性、非经典理性和后非经典理性的第一个标准是所研究客体的系统组织类型。在斯焦宾看来,经典理性用于把握简单组织的系统客体,非经典理性用于把握复杂的自我调节的系统,而后非经典理性用于把握复杂的自我

发展系统。在科学知识中，每一种类型的系统客体都由相应的独特的科学世界图景（学科的本体论）和一般的科学世界图景表示。这些世界图景规定了科学研究对象的系统-结构视野，进而提出了关于所研究对象的某种系统组织类型的概念。第二个标准是活动方法的一般图式的差异，这个图式记录与被研究客体有关的手段和操作（活动）的特征。在科学史上，每一种新型的系统客体都假定有一个与其对应的认识活动方法的图式。这一图式在科学基础的结构中表现为对科学理想和规范的具体理解：解释和描述的理想、证明和论证的理想、结构和科学知识建构的理想等。经典理性、非经典理性、后非经典理性的区别就是对科学的理想和规范的解释不同。第三个标准是可以区分活动主体价值目标结构的特征。这些结构是以两种方式来确定：一方面，它们必须与系统对象的类型相适应，相应历史时代的科学必须增加对该对象的认识；另一方面，它们必须符合该时代文化中所接受的主流价值。因此，“不同类型的系统客体需要对价值目标活动结构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思。这些反思类型被纳入科学的哲学和世界观基础，科学的哲学和世界观为科学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规范结构提供了依据。对研究价值目标结构的反思类型的变化表现为科学的哲学和世界观基础的相应变化。”（[6], p.251）归根结底，新的反思类型才是新类型科学理性（经典、非经典、后非经典）形成的重要特征。

17世纪以后，经典理性在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长达两个多世纪。经典理性以研究对象（客体）为中心，在解释理论和描述过程中力求消除一切属于科学活动主体、手段和工具的内容。（[2], p.633）科学的内在目标和价值决定着科学研究战略和结果。在这一阶段，尽管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影响着经典科学研究，但经典科学并不理解这些文化的含义。以机械的世界图景为例，它认为宇宙的基础是不可分割的粒子（原子），所有物体（固体、液体、气体）都是由这些粒子组成的。原子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力的瞬时传递（超距离作用）实现的，原子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

用的过程在绝对空间中随着绝对时间的推移而进行，这个过程是物体和物体之间力的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服从拉普拉斯决定论。空间和时间被视为客体外部的绝对的东西，人们相信物体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空间和时间的特征。在机械的世界图景的统治下，人们以相应的哲学范畴（例如部分和整体、事物和过程、相互作用和因果关系、空间和时间等）去理解和掌握简单物理系统。即使是在第二次全球科学革命即麦克斯韦创立电磁学理论以后，对机械的世界图景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但在物理学中建立起来的电动力学世界图景中，也没有超越经典科学简单系统的概念。进入20世纪，面对更加复杂的系统组织，经典科学首先是通过已经建立的本体论原则和与简单系统相对应的科学理论来解决问题，但经典理性的不足很快就暴露出来。在经典理性框架之外积累了许多新的科学事实，同时在试图解释这些新事实时出现了各种悖论。按照库恩的观点，这些情况被描述为科学革命之前的反常现象和危机。^[7]

20世纪初形成了一种新的科学思维方式——非经典理性。非经典理性考虑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活动的方法、手段、工具性质之间的联系，但是，科学与社会价值和目标之间的联系仍然不是非经典理性反思的对象，尽管社会价值隐含地决定了知识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在科学世界中区分和理解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进行这种区分和理解。与基于机械的笛卡尔-牛顿世界观的经典科学相比，非经典科学更加注重科学概念的动态性和科学理论的真实性，承认描述同一物理现象的多种不同理论、方法的平等性。非经典理性不再对主体和客体进行严格的区分，在实验的理论解释中纳入认知活动的手段和操作环节，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测量工具性质密切相关。（[2], p.634）开始出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理论语言的复杂化和物理学理论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非经典科学的世界图景和认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因与结果、偶然性与必然性、部分与整体等范畴得到了重新解释。研究对象的范畴

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事物。非经典理性不以寻找客观世界的本质为目的,而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现象为目的,这些现象是通过人的经验(感官的、智力的、直觉的)赋予人的。在论及经典理性与非经典理性的区别时,斯焦宾特别强调:经典理性的特点是只关注研究对象本身,而不考虑活动主体和手段;而非经典理性的特点是对科学活动的手段和操作环节的重新思考。

后非经典理性的概念甚至比科学理性的概念更加广泛,因为它不仅包括逻辑和方法论等理性标准,还包括分析人类自身的行为、社会文化、精神价值和人的意义等内容。受到莫斯科方法论小组领袖谢德罗维茨基(Г. П. Щедровицкий)“活动论”的影响,斯焦宾认为后非经典理性的出现是因为科学认识问题在新的理性范式中被赋予了新的视野,需要将反思的领域从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科学活动。后非经典理性不仅考虑了所获得的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与科学活动手段和操作的相关性,还考虑了科学内部价值目标与非科学的、社会的外部价值目标之间的相关性。([2], p.635)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人类文明出现了“反人类”后果的发展趋势,这就引发了对崇拜科学理性的批判,并表现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的思潮。众所周知,在理性主义看来,认识主体与研究者本人的意志品格没有关系,认识主体的思维活动仅被视为获得特定结果的客观方法,主体并不关心这个特定结果会有什么后果。经典或非经典理性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往往具有反主体性、反人本性、无情感性等现实特点。相反,后非经典理性把认识行为的主客关系融合起来。爱与信仰等情感感官因素和情感意志因素作为主要的认知手段被纳入后非经典理性的内涵中,强调了人格、价值、情感、意志以及其他心理因素在认知活动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斯焦宾提出的“后非经典理性”归结为以下六个基本特征:(1)整体论范式和全球进化论,强调跨学科和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形式;(2)物理思维和生物思维的趋同性,也就是把

存在和发生、实在和过程结合起来思考问题;(3)以开放和自我发展为特征的独特系统(自组织系统)日益成为现代跨学科研究的对象,人成为其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4)出现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性化趋势。人不仅作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且作为系统形成的原则进入新的世界图景。这表明人的思维不仅具有价值目标取向,而且具有主客体内容相融合的特征;(5)21世纪新的研究方向是非线性、不可逆、不平衡、混沌理论等,协同学是后非经典科学的理论范式,这是一种研究开放非平衡系统行为的自组织理论;(6)“理性”的概念扩大了新的范围,包括直觉、灵感、不确定性、启发性和其他非经典理性主义传统的语用特征,例如有用性、便利性、有效性等。总之,后非经典理性“对空间和时间范畴(考虑到系统的历史时间、时空形式的等级)、可能性和现实性范畴(“分叉点”中大量潜在发展方向的思想)、决定论范畴(先前的历史决定了系统对外部影响的选择性反应)等都有了新理解。”([5], p.17)

三、“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出场及其当代价值

斯焦宾院士是“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创始人,从而实现了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经典(或非经典)科学哲学”向以社会-文化主义为代表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转变。俄罗斯学者认为,斯焦宾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实现了四个最重要的哲学方法论转向:(1)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形成了主体、手段(操作)和客体的整体化趋势以及科学活动不同形式的方法论基础;(2)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整合了科学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3)在科学活动中引入了伦理规则,整合了科学的真理性标准和目标价值性标准;(4)把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作为一个理性建构的框架来统一以往的科学理性。^[8]作为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与俄罗斯科学哲学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斯焦宾的研究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认知-方法论导向与社会-文化导向的高度统一。他特别重视把认识论的

变化和价值论的变化的转换联系起来：一方面，他对科学理论的发生学研究十分独到，突破了传统反映论的狭隘眼界，指出决定理论结构的与其说是所研究的自然客体，不如说是科学和社会实践的结果，进而把科学发生的动力学要素归结为科学的世界图景、科学的理想和规范、科学的哲学根据（如方法论原则等）。另一方面，他又把科学知识的根据研究转到社会-文化语境分析上来，指出决定建立新科学知识根据的不仅是在预见新事实、新模型基础上的新理论，而且是社会-文化的制度要素。而后非经典科学哲学就是要着眼于分析科学活动的价值-目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斯焦宾是苏联认识论主义科学哲学的终结者，也是俄罗斯社会-文化主义科学哲学的开拓者。众所周知，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生了三次转向：历史主义转向、文化主义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转向。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是一种典型的科学认识论或科学知识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库恩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真的经验命题”，也不同于波普尔的“客观知识”，而是负载人的价值的历史的产物。科学文化哲学则彻底突破了知识论的桎梏，它所关注的不再是单一的知识，而是探寻知识背后的文化根源和内含于知识中的“人维度”。站在一般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的角度上看，斯焦宾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与世界科学文化哲学具有趋同演化的趋势。现代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科学认识论，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罗蒂等）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否定，必然导致对真理或科学价值的否定。也就是说，后现代科学哲学从根本上否认认识论的重要性，斯焦宾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早在苏联解体之初，在谈到俄罗斯哲学未来发展时他曾提出“两个不要”：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不要隔断与前辈优秀传统的纽带。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看，斯焦宾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也许是一种文化主义的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但绝非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

进入21世纪，斯焦宾转向对技术型文明的批判分析，探索人类新型文明下一步发展的途

径。他坚信自己对现代文明发展阶段的判断，即“现代文明已经进入了不稳定、不确定的阶段，而且处于一种危机状态。”^[9]与经典科学哲学不同的是，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以科学认识和科学发展的主体为中心，将科学认识的价值目标结构与影响其世界图景和个性特征的文化联系起来；而科学发展与社会环境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为技术型文明转变为新型的文明组织提供了基础。人类文明的转型需要全面的社会创新，而在社会创新过程中，后非经典科学哲学将发挥主导作用。斯焦宾认为，在分析技术型文明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取向时，刺激消费超前增长和商品市场关系全面入侵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是最重要的原则，结果必然造成环境和人类危机加剧。斯焦宾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向一种全新的文明发展类型过渡。”^[10]斯焦宾把当下引发自然界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类-文化危机（人的危机）的文明类型定义为技术型文明（техногенн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这种文明持有一种纯粹建构主义的态度，主张通过科学技术重新创造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将自然界视为完全受人类控制的取之不竭的资源宝库。斯焦宾警告说，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的灭亡，需要寻找打破现有僵局的方法和出路。而这样的出路与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道德律令有关，通过实施这些律令用集体智慧去遏制和规范市场全球化的自发力量。斯焦宾认为，在现有条件下需要找到了新价值观的“生长点”，例如非暴力伦理学、科学技术的人性化、个人修养、共同的价值等，通过培育这些价值观，就可以帮助人类摆脱当前技术型文明的危机，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人本学文明”（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然而，“人本学文明的到来并非预定的，它可以出现，但也可以不出现。在后一种情况下，人类就是在等待死亡。因此，我们理应确保新型价值观的现有生长点能够成为普遍接受的生活和认识的规范。”（[11], p.62）

“我们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关于人、人维度系统（生命系统）的新理论、新理解以及

建立新的混沌-自组织理论(Теория хаоса-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ХС)的时代。所有这些都要求新科学(ТХС)的特殊发展和在ТХС框架内创造新的概念和方法。……所有这一切都始于我们杰出的斯焦宾院士的工作。”^[12]在后非经典科学理性的背景下,既要遵循科学的内部规范,也要遵循外部的即非科学(社会)的伦理规范。斯焦宾的独特之处就是把新价值观的“生长点”与他所提出的后非经典科学理性联系起来,综合考量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人类生态系统。在这些系统(主要包括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中,人不是从外部把握他所要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人本身就包含在这个系统中,认识和改造活动发生在系统的“内部”并改变系统特性。这就使每个人对他的行为负有特殊责任,他必须严格遵守道德律令,其中最重要的是严禁破坏环境。因此,斯焦宾把此类系统称为“人维度”系统,人类对这些系统的影响必须与这些系统中客观存在的发展预期及其实现的可能性相一致。在实现系统预期目标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人的价值,以实现有利于人的发展并阻止导致人的退化的可能性。斯焦宾确信:“处于后非经典理性阶段的科学认识应该最大限度地考虑人的价值。在确保客观认识的前提下,这一阶段的认识都将是价值荷载的。”([11], p.62)

除了意识到技术型文明未来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斯焦宾还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局限性,进一步发展了莫伊谢耶夫(Н. Н. Моисеев)院士提出了共同进化(коэволюция)的概念。“作为共同发展(со-развитие)的共同进化的概念决定了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13], p.68)共同进化问题开辟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因为共同进化事关全人类生与死的问题,所以它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莫伊谢耶夫强调指出,要确保关于共同进化的科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它应该为人们提供重要的知识并回答这一问题:“为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继续存在并进一步完善人类文明,我们需要做些什么?”([13], p.69)斯焦宾进而提出了全球(普遍)进化(глобальная эволюция)的概念,认为在后非经典科学中宇宙演化过程

的普遍性可以概括为全球进化的概念,这一概念描述了“非生命自然界、有机世界和社会生活三个领域真正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图景的情形。”([2], p.641)因此,尽管全球进化的概念建立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但它仍属于科学世界图景的哲学层面。20世纪40-50年代,一般系统论的出现和系统方法的形成,为进化论的概念带来了全新的内容,全球进化正是将进化论的思想与系统论的思想结合起来,即把对发展的现象学的描述与系统分析的思想方法联系起来。尽管许多自然科学为支持全球进化论做出了贡献,但20世纪科学中三个最重要的思想在构建现代一般科学世界图景的原则中发挥了决定性意义:“第一,非稳态宇宙论;第二,协同学;第三,生物进化论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物圈(биосфера)和智慧圈(ноосфера)概念。”([2], p.646)可以说,进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物圈和智力圈的概念为支持所有过程普遍联系的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它证明了进化过程的不可逆性,明确指出了其中的时间维度。按照维尔纳茨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的理解,“生物圈”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和进化特性的整体系统,是一个特殊的地质体,“生物圈”的结构和功能由地球和宇宙的具体特征决定的;而在莫伊谢耶夫看来,“智慧圈”是一个需要全人类付出集体智慧和集体意志才能达到的一个历史最高级阶段,在此阶段足以确保自然界与社会共同进化。斯焦宾认为,“智慧圈”思想的本质是人(人类)与“生物圈”进化的统一过程。事实上,这一思想不仅为人类生存设定了条件,而且为克服技术型文明危机提供了价值引领。作为一个后非经典科学哲学家,斯焦宾深刻理解生物圈的非线性特点及其状态的难以预测的跳跃变化。“这证明他呼吁密切关注生物圈并与其建立起伙伴关系而不是消费关系是可贵的。”([13], p.68)斯焦宾不仅在概念层次上,而且在哲学方法论上把生物圈定义为一个与社会-文化自我发展系统密切相关的自组织系统。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任何社会形态存在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人类的生活创造最大的

舒适感，主导思想就是源于培根的人类中心主义（антропоцентризм）。时至今日，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就是保护作为我们共同的家园和栖息地的生物圈，因为一旦失去了生物圈，就等于人类给自己下达了死刑判决书。

结 语

斯焦宾为建立和发展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体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实现哲学人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综合、大转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当今时代是一个复杂程度呈指数增长的时代，现代文明是面临着新的“分叉点”和决定性地选择其未来发展道路的文明。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为“人本学文明”提供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建设性方案，该方案无疑是面向未来的，甚至无需强调它对于充分理解现代文明发展中普遍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斯焦宾奠定了新哲学和正在发展着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人维度”综合研究和混沌-自组织理论），也指出了人类与非生命界、生物界一道实现全球进化而不仅仅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中的理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在现代科学和哲学中尤其被低估了，因为从经典理性到非经典理性再到后非经典理性还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例如，从稳定的传统社会到难以预测的技术型文明社会，再到知识协同的后工业社会等。正是在不断变化的理性类型和范式的背景下，人们才能动态地思考哲学人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大综合。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后非经典科学存在着科学泛化的现象，这样就会使科学失去了其应有的规范性和独特性，这是因为科学毕竟不等同于一般文化。但我们必须承认，由斯焦宾院士奠定基础的后非经典科学哲学不仅历史性地出场了，而且正在影响着心理学、教育学、法律和管理学等领域。^[14]

〔参考文献〕

[1] 万长松. 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B. C. 斯焦宾院士思想轨迹追踪[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5, (1): 120-

- 127.
- [2] Стёпин, В. 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Знание*[M]. М.: Прогресс-Традиция, 2000.
- [3] Буданов, В. Г., Еськов, В. М.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ка и Третья Парадигма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J]. *Сложность. Разум.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ка*, 2019, (1): 53-61.
- [4] Галкин, В. А., Еськов, В. М., Филатова, Д. Ю. 'Философи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J]. *Сложность. Разум.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ка*, 2019, (2): 43-44.
- [5] Стёпин, В. С. 'Научное Познание и Ценности Техноген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9, (10): 3-18
- [6] Стёпин, В. С. 'Классика, Неклассика,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ка: Критерии Различения'[A], Киященко, Л. П., Стёпин В. С.(Eds.)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ка: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а, Культура*[C],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Лом «Мирь», 2009.
- [7]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李宝恒、纪树立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61-62.
- [8] Аршинов, В. И., Буданов, В. Г. 'Концепция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 С. Стёпина и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Эволюционизм Н. Н. Моисеева'[J].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2019, (4): 96-112
- [9] Стёпин, В. С. 'XXI Век-Радика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Типа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A], *Глобальный Мир: Системные Сдвиги, Вызовы и Контуры Будущего: XV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Лихачев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Чтения, 18-20 Мая 2017 Г.*[C], СПб.: СПбГУП, 2017, 185.
- [10] Стёпин, В. С. 'Социальные Системы и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Их Будущих Состояний'[A], *Контуры Будущего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ирового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XV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Лихачев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Чтения, 17-19 Мая 2018 Г.*[C], СПб.: СПбГУП, 2018, 181.
- [11] Лекторский, В. А. 'Н. Н. Моисеев (1917-2000) и В. С. Степин (1934-2018): Два Пророка в Своем Отечестве'[J].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2019, (4): 58-62
- [12] Еськов, В. М., Филатова, О. Е., Галкин, В. А., et al. 'Стёпина: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J]. *Сложность. Разум. Постнеклассика*, 2019, (4): 62-68.
- [13] Лепский, В. Е. 'Творцы, Устремленные В Будущее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Н. Н. Моисеев и В. С. Стёпин'[J].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2019, (4): 63-75.
- [14] Хабриева, Т. Я. 'Интервью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В. С. Стёпина'[J]. *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я И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и*, 2019, (4): 155-164.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